

东北亚区域合作

“去安全化”：上海合作组织 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独特路径

曾向红 杜佳明

[摘要] 在国际社会中,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一般采取“安全化”的发展路径。然而,上海合作组织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去安全化”的安全共同体构建路径。具体而言,上合组织遵循的“去安全化”路径首先体现在“上海五国”机制到上合组织的转变中;其次,“发展安全”理念和实践助推其“去安全化”进程;最后,上合组织向成员国赋予的“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较好地反映了“上海精神”,促进了上合组织发展的“去安全化”。从马克斯·韦伯的四种行为动机出发,可以发现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之所以采取“去安全化”的路径,其深层考虑在于全面回应上合成员国对组织的四种诉求与期望。其中,工具理性逻辑强调的是上合组织的安危共担,价值理性强调上合组织对成员国赋予的“薄的承认”,“情感”强调上合组织对成员国赋予“厚的承认”,而“习惯”旨在满足成员国渴望增强地区团结的需要。事实证明,“去安全化”的路径对于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化;去安全化;安全共同体;行为逻辑;中亚地区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5.04.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5)04-0076-(16)

[收稿日期] 2025-02-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VXJ038);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战略发展专项项目(2024jbkyzx003)

[作者简介]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杜佳明,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兰州 730000)

2024年7月,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上合组织“五个共同家园”的重要倡议,即建设上合组织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共同家园,为新形势下上合组织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1]如今影响上合组织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如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

NORTHEAST ASIA FORUM

竞争重趋激烈、“相互依赖武器化”导致泛安全化现象持续存在、组织内部不断出现的考验等。如何构建更加美好的上合组织家园,凝聚组织内部共识,中国政府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经略上合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促进上合组织的长远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是“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必经路径,这也是上合组织当前的发展目标。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维护安全 and 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2]这表明了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上合组织长远发展的重要价值。

2024年4月,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强调:“我们要共同打造一个更稳固坚韧、更开放包容、更具影响力的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为维护共同利益提供坚强保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3]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对于上合组织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已得到决策者的充分重视,但目前尚未从学理层面上得到充分说明。我们需要对关于上合组织理念和愿景提出的必要性、达成的可行性、推进的具体路径做出恰当的说明,以真正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此,本文提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路径,认为这是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构建取得重要进展的重要且独特方式,有助于为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新的启发与思路。具体而言,所谓“去安全化”是地区组织的成员不把其他行为体的发展壮大视为自身的安全威胁,而是在开展安全合作的过程中以协商对话而非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彼此争端。“去安全化”的实施路径往往是减少对那些容易被安全化问题的安全化叙事,如移除某些被过度“安全化”的问题并将其置于正常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领域进行处理,促进去威胁化的对话与合作。本文以“去安全化”为切入点,希望能为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带来必要启示。

一、“安全化”: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一般路径

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重视对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建设安全共同体来缓解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始于西方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带有明显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色彩,我们可以将安全共同体理解为不同行为体共同构建安全化的集体行为。虽然“安全化”路径在安全共同体构建中发挥重要价值,但“安全化”的实质仍是西方主流的现实主义,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安全困境,甚至会加剧行为体之间的彼此猜疑,这种路径不利于安全共同体的长久发展。随着“安全化”研究议题日趋成熟以及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对“去安全化”在安全共同体构建中发挥作用的探索,已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一)“安全化”与安全共同体的构建

当前,学界对“安全化”研究主要侧重于界定安全的概念和实践,如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的实质是“安全议题化”。他们采用语言学建构主义分析工具,认为“安全化”的言语表达在某一领域推动特殊政治进程以应对威胁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强调言语建构在安全认知中的作用。^[4]巴黎学派通过研究所谓“不安全管理专家”的实践,发现他们是通过“实践”来建构安全场域和意义体系。^[5]还有学者注意到“安全化”与“全球南方”的关联性,认为“全球南方”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主流安全思想所忽视。^[6]基于既有研究的观点,本文认为“安全化”指

的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它也是一个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安全的议题通过社会建构纳入安全议程以促进安全目标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言语行为,还包括一系列制度化实践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因各国各领域形势有异,对安全化相关议题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背景下的安全实践特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安全化”研究正实现与“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合流。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在“安全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宏观安全化”(Macrosecuritisation)以解释安全共同体的发展。^[7]这里的安全共同体概念不是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最初提出的概念,^[8]而是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等人在《安全共同体》一书中从建构主义视角提炼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安全共同体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区域,这些主权国家的人民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的预期。他们指出,成员具有共享的身份、价值观和意义是安全共同体最重要特征之一,这种共享的身份、价值观和意义为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国家间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9]并非所有的“安全化”都能促进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如奥利·维夫(Ole Wæver)认为,如果“安全化”是为了彼此的共同安全,则有助于巩固该共同体的发展,如果“安全化”被当作是某一国家的政治工具或借口,那么它就包含着一种政治风险,不利于安全共同体的发展。^[10]欧洲一体化研究学者以及国际关系学者一致认为,欧盟是国际关系中安全共同体的典范。^[11]安德斯·维维尔(Anders Wivel)和维夫认为,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政治日益安全化。欧盟安全化具有双重性,批评者认为欧盟对国家的身份存续造成威胁,而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将批评者视为安全风险,因为欧盟是阻止欧洲国家“再国有化”(Re-nationalisation)的最后一道屏障。^[12]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将中俄视为主要威胁以凝聚西方世界的力量,反映出美国的安全化行动变本加厉,并且受到地缘政治文化的影响。^[13]

伴随着“安全化”议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安全化”的快速推进很有可能限制正常政治的运作。^[14]伦敦国王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克劳迪娅·阿拉多(Claudia Aradau)甚至将“安全化”定义为消极的事物,她认为安全化促使那些属于该共同体的人以及不属于该共同体的人更加对立,难以实现真正安全。^[15]在意识到过度依赖“安全化”路径构建安全共同体很可能导致排他性认同的强化和分化政治的加剧后,安全研究者开始日益关注“去安全化”议题,认为这对于缓解安全化带来的负面效果或把握国家偏离“安全化”进程的安全行为可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二)“去安全化”: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安全化”的结果反而使得不安全成为社会的普遍状态,成了国家运用“(不)安全化”技术对社会进行监视的合法、正当的理由。^[16]无论“安全化”还是“去安全化”都是国家等行为体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全球安全往往被安全化、去安全化、风险化等进程所形塑。^[17]在过去的研究中,“安全化”往往是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一般路径,对于“去安全化”的研究往往置于“安全化”之后。在理论发展过程中,部分学者对“去安全化”的研究框架进行了重要调整。他们不再局限于分析“安全化”之后的阶段,而是将研究视野前移,将“安全化”发生前的预防性机制纳入考察范畴。^[18]也有学者认为“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并非相互排斥,甚至是可以同时进行的。^[19]总而言之,目前关于“去安全化”何时从“安全化”中转化的研究面临较多挑战,布赞甚

至坦承影响“去安全化”的因素非常多,判断某一问题是否应当被“去安全化”是非常困难的。^[20]

在“去安全化”的安全共同体类型上,过去的研究侧重于前殖民宗主国,往往忽视“全球南方”的视角。有学者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进行完善,他们认为前殖民宗主国通过自愿接受共同规则来建立彼此去安全化的安全共同体,而前殖民地国家对彼此去安全化的区域组织设想是建立在不强制执行规则的承诺基础上。^[21]一般而言,当今国际社会表面上缺乏的是安全,实则缺乏信任。^[22]鉴于“去安全化”是对相互间安全问题的淡化,以此为视角,西方学者开启了对安全共同体的经验研究,并据此认为西欧已经成为一个后主权的、新的帝国实体,它由以欧盟为核心的几个政治同心圆构成,西欧成为一个安全共同体是“去安全化”的最终结果。^[23]关于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讨论,国内外学术界并不乏相关研究成果。例如,马克·兰特根(Marc Lanteigne)通过考察上合组织成立五年以来在欧亚地区安全合作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安全共同体”。他还认为,如果上合组织“自信持续增长,并且将其影响力拓展至最初使命范围之外,那么它将成为一个演变中的地区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24]至于对“去安全化”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詹姆斯·麦克哈菲(James MacHaffie)认为,“互信”是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构建所必需的唯一要素。^[25]整体而言,对于“去安全化”路径在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体现和逻辑上,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尚不深入。

综上所述,“去安全化”为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并不是否定过去大量的关于“安全化”研究工作,事实上,本文是在汲取过去学者们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研究。而且,考虑到上合组织与中国周边、多边外交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该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基于此,以“去安全化”为视角研究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去安全化”路径

回顾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主要采取的是“去安全化”的路径。具体来看,上合组织以“去安全化”路径构建安全共同体主要体现在“上海五国”机制到上合组织的转变、“发展安全”理念和实践、上合组织对成员国“薄的承认”以及“厚的承认”。

(一)“上海五国”机制到上合组织的转变:“去安全化”的初步实践

上合组织起源于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依旧延续“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议程。回顾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为上合组织的初期议程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框架和工作模式,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上合组织“去安全化”的萌芽。“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形成有赖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均意识到来自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共同安全威胁。在此基础上,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首先就边境稳定问题达成协议。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领导人在上海会晤,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旨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加强边境军事互信,这份文件签署后,形成了“上海五国”概念,“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由此启动。^[26]“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运行离不开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涵的“上海精神”。“上

海精神”对上合组织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建设上,它旨在促使成员国在解决争端问题时能够达成共识,有助于让成员国培育初步的共同体意识。

“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议程不断扩大,由最初缓和边境局势、加强军事信任平台的定位,逐步延伸至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2001年6月15日,原“上海五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举行峰会,宣告上合组织正式成立,标志着上合组织由过去的会晤论坛转变为正式的国家间合作组织。从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看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寻求“去安全化”的愿望。上合组织的成立不仅是成员国共同探索区域治理新路径的集体实践,更是对冷战思维下对抗性结盟模式的突破性尝试。在全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变局交织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坚持的“上海精神”与冷战时期对抗与零和博弈的思维迥然不同。“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去安全化”在思想上的集中体现,它被写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27]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指导原则。综上,这一转变历程不仅反映了上合组织在区域合作中从安全领域逐步向更全面、更稳定的合作方向转变的愿景和实践,也是上合组织“去安全化”的初步实践,有助于上合组织在一个更完善的机制框架内通过“去安全化”路径以实现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

(二)“发展安全”理念和实践助推“去安全化”进程

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以“上海精神”为指引,坚持“发展安全”理念,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相较于“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是行为体寻求安全的更高层次。从安全的领域和程度来看,欧洲所呈现的“共同安全”窄而深,东盟所呈现的“合作安全”宽而浅。^[28]相较于前两者,上合组织侧重的“发展安全”更具有务实性。“发展安全”理念有助于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意识建设层面提供一个舞台,如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推动的欧亚经济一体化等外交理念都成为了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具体实践,这些实践均不再以“安全化”将对方视为威胁,而是以伙伴关系推动彼此的发展。作为创始成员国,中亚国家始终是上合组织多边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方。冷战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影响中亚地区,在内外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中亚各国独立开展地区合作的历程充满艰辛,其最初的探索以失败告终。^[29]20世纪90年代末,中亚国家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通过与美国等域外强国的双边关系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与俄罗斯的关系。^[30]其中上合组织的“发展安全”理念契合中亚国家这一时期的需求,于是中亚国家借助上合组织在谋求“生存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发展安全”。

如果说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经济相互依赖是彼此关系的“压舱石”,那么上合组织对“发展安全”理念的实践则是推动地区稳定与共同繁荣的关键动力。上合组织始终坚持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的理念,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实施“小而美”的民心项目,旨在提升民众对“上海精神”的认同感,增强成员国对组织的归属感。^[31]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合作项目多于多边合作项目已是客观事实,为此,协调各成员国之间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关系,使两者之间形成相互协作、彼此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是推动上合组织提高组织制度效率的重要途径。以“发展安全”为理念,上合组织积极探寻破解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的密码。上合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在经济合作方面提出了12项倡议,超过了安全领域的9项倡议,这说明加强多边经贸合作将成为上合组织未来十年的主要战略任务。^[32]2018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总量逐年提升,^[33]经济总量的提升是上合组织“发展安全”实践的重要

成果和直接体现。综上,“发展安全”理念和实践为构建更加稳定、繁荣的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为此,上合组织成员国找到了安全与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径。

(三)排除引信:上合组织对成员国“薄的承认”

“上海精神”作为上合组织“去安全化”思想上的载体,因其在承认各成员国主权的同时也强调尊重各成员国之间的文化或文明差异,我们可以从承认理论的视角来看待“上海精神”的内涵。从承认理论的角度观之,“去安全化”与“承认”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去安全化”的过程,往往需要“承认”作为前提和助推器。承认理论区分了两种承认形式:“薄的承认”(thin recognition)与“厚的承认”(thick recognition)。其中,“薄的承认”的承认对象是大同主义意义上的“普世的人”(universal person or sovereign person),即只要是人就应享有的基本权利。^[34]这种承认形式体现在国际关系中,是指国家之间彼此承认为国际共同体的成员,而且是享有平等主权的同类国际行为体。“厚的承认”是在“薄的承认”的基础上尊重行为体的特殊身份,如个人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对自身特性的维护、国家对大国地位和威望的追求等等。当一个行为体被充分“承认”时,各方对其动机、利益和身份认同就更容易达成一致或妥协,从而削弱了安全化话语中对其的“威胁”定位,这正是“去安全化”的核心机理之一。相反,如果缺乏足够的“承认”,相关行为体可能始终被排斥于正常政治互动之外,很难摆脱安全威胁的标签。基于此,“承认”既为“去安全化”提供了政治和社会基础,又为各行为体搭建了互信与合作的平台,使议题能更自然地回归常态化范畴,进而为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区域或国际合作创造可能。

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尊重国家的主权,这是给予成员国“薄的承认”的体现。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不干涉内政”原则这一核心的主权规范作为原则化信念。^[35]从《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能够看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国家主权视为自身的核心利益,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与欧盟成员国通过让渡主权建立安全共同体不一致,欧洲一些国家主权侵蚀的发生往往是自觉的、自愿的。^[36]但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的现实情况与一些欧洲国家不同,上合组织多数成员国面临的是边界的争端、主权安全等问题,它们最基本的诉求也往往是与获得“薄的承认”息息相关。上合组织坚持的“反对域外大国干预、尊重各国主权、强调联合国和多边主义、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四个核心原则与成员国的安全诉求一致。^[37]不同于北约的主要针对外部安全风险的功能定位,上合组织侧重于成员国的组织内部安全,在关于主权的议题讨论中,上合组织往往持有谨慎态度。^[38]从目前来看,给予成员国“薄的承认”仍然是上合组织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源泉,这一“薄的承认”模式有效化解了成员国之间潜在的主权冲突,从机制层面确保了上合组织在推进安全合作的同时不触及各国主权底线,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韧性的区域合作机制。

(四)增进团结:上合组织对成员国“厚的承认”

“厚的承认”体现的是对国家特殊性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对获得尊重、荣誉、地位等的心理诉求。^[39]上合组织的“厚的承认”是对差异的尊重,是保障存在较大差异的成员国之间能够取得良好合作成效的前提。上合组织成员国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们分别来自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和东欧,它们在社会制度、国家实力、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实际上,上合组织不是西方话语中所谓的“清谈馆”,而是在尊重成员国差异性的同时积极有为的典范。上合组织没有出现成员国之间争斗不断的情况,而是给予成员国“厚的承认”。基于在上合组织内“厚的承认”的获取,各个成员国会表现得更加团结,也会加强彼此的互信,这有助于塑造成员国之间共同体的意识。西方世界往往持有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西方学者认为实现和平需要消除差异,^[40]民主和平论就是这种消灭差异倾向的典型代表。^[41]上合组织作为非西方的行为体,其“去安全化”的实践有其独特性,对于其超越了“民主和平论”对国家间关系描述的现象:尊重成员国政体类型差异、不强求也不推崇国家政权性质同一性,我们可以使用上合组织对成员国给予“厚的承认”来理解。

上合组织的“厚的承认”让成员国感受到被尊重,得到了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拥护,这有助于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持续性。^[42]与此同时,“厚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上合组织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内部环境。通过承认并尊重成员国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异,上合组织能够为各国创造一个宽容多元的合作平台,使成员国感受到积极的包容与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在敏感的安全议题上,各国也更愿意以对话与协商的方式寻找共识,而非借助外部压力或军事威慑。对于中亚地区的成员国来说,这种避免制度同化的多边合作模式,既保障了国家自主性,又增进了彼此间政治互信,它们能够在实现上合组织“去安全化”的进程中发挥其自主性。^[43]从实践效果来看,成员国之间的团结程度反而在应对突发危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2020年11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指出,“成员国将构建更具代表性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44]由此,“厚的承认”不仅是上合组织持续保持凝聚力与行动力的重要基础,也成为其在全球治理和地区安全治理领域获得更多国际认同的关键支撑。

综上所述,上合组织的“去安全化”路径已通过多维度的机制设计和实践形态得以初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多数国际组织在安全共同体构建时并非只采取“安全化”路径或“去安全化”路径,它们往往有所侧重地采取两种路径以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发展。正如上合组织以“安全化”手段应对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所展示的,上合组织并非只采取“去安全化”手段,而是将“去安全化”和“安全化”相结合并侧重于“去安全化”手段。对于这两种手段的结合,有学者提出,上合组织应当灵活运用“协商一致”和“不干涉内政”决策原则,积极考虑实施“建设性介入”政策。^[45]本文并不否认上合组织在实践中以一定的“安全化”手段巩固彼此信任这一事实。不过,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尝试阐明“去安全化”在上合组织成功开展安全合作、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过程中的意义。

三、上合组织以“去安全化”路径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深层逻辑

在开展“去安全化”路径构建安全共同体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时,本文尝试借鉴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四种理想化模型,即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感”和“习惯(传统)”。^[46]基于利益考虑的安危共担原则被视为上合组织对工具理性的实践,上合组织行为中的“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分别类似于人类行为动机中的价值理性动机与“情感”

动机。最后,深化团结是上合组织对于“习惯”动机的实践。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上合组织“去安全化”路径的深层逻辑。

(一)上合组织对工具理性的实践:安危共担

在韦伯的行为动机分类中,工具理性强调的是行为体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47]具体到上合组织的合作实践,安危共担原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质,即行为体基于“成本—收益”来判断行动的可行性与效用。各成员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毒品走私等跨国性安全威胁时,均认识到凭借单一国家之力难以取得有效成果。基于此,各国希望通过加强安全合作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上合组织在成立之初,它源于“上海五国”对具有跨境特征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共同关切,^[48]正是在这一共同关切的基础上,成员国逐步建立了机制化的合作模式。^[49]从这个角度看,“安危共担”既是对外部风险的工具理性应对,也是对内部成员国各自安全与发展需求的一种功能性协调。“安危共担”不仅是现实主义视角下各成员国“共同应对跨国威胁”“共同分享安全收益”的一种有效策略,更体现出成员国在“去安全化”进程中,为求互利共赢而不断降低彼此威胁感的集体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各成员国的合作动机始终围绕如何有效平衡“成本—收益”展开。

“安危共担”作为一项实践原则,反映出各方在“去安全化”框架下追求务实利益与长期稳定的理性选择。这种以“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的集体行动逻辑,使得上合组织的多边合作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持续推进,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区域安全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上合组织是第一个提炼出“三股势力”概念并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的国际组织,它也是第一个提出并从法律上明确指出了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定义的组织。^[50]正是在这一系列实际举措中,“安危共担”原则使成员国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更大程度的安全保障,并在处理共同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彼此间的合作黏性。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第十九次峰会上指出,要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51]本文认为这种高度契合工具理性的“安危共担”原则,有助于在行动层面持续塑造“去安全化”的氛围:各成员国之间并非互为威胁,而是相互支撑,共同抵御外部冲击并谋求区域长期稳定与繁荣。通过“安危共担”,上合组织得以在实践中深化内部信任的基础,也为其下一步在价值、情感与习惯等更深层次的动机领域夯实了互信与合作的根基。

(二)上合组织对价值理性的实践:“薄的承认”

上合组织的“薄的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回应的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对于“价值理性”的诉求。一般而言,“工具理性”强调手段的运用,“价值理性”更强调价值的关怀。价值理性以其对各成员国主权的尊重,从而使各成员国对组织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有助于强化各成员国对组织的制度认同。试想欧洲国家基于“文明标准”拒绝给予非欧洲国家“薄的承认”,那些非欧洲国家会将是否赋予本国“薄的承认”作为其衡量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因素。欧洲国家往往以一个安全共同体的形式进行对外交流,它们一般对那些不属于该共同体的成员采取或打压或拉拢的手段。过去上合组织成员国往往面临着“要么接受西方标准进行自我改造,要么被排除在国际合作之外”的困境,可见它们在西方世界中未能获得“薄的承认”。一旦国家未

能获得“薄的承认”,意味着其国家主权是不完整的,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物理生存。其他国家可以以该国不属于国际社会的完全成员为由,拒绝尊重其主权。^[52]上合组织通过坚持“薄的承认”,构建了一种不以消除成员国主权为前提的合作机制,为成员国提供了在保持自身主权稳定的同时参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上合组织的“薄的承认”与成员国价值理性诉求的契合还在于:它将主权平等视为一种价值选择而非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它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种在不放弃政治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参与国际合作的路径,使国际组织成为多元文明平等对话的平台。它拒绝接受“文明标准”作为国际交往的前提条件,通过尊重各国主权的形式来强化成员国的心理归属感,有助于满足成员国对平等安全共同体的内在需求。需要说明的是,与欧洲国家通过大规模让渡主权来追求一体化不同,上合组织成员国往往拥有更多元的政治、文化背景,较多成员国拥有曾被殖民压迫的历史,可以说它们的国家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追求主权独立的历史。为此,上合组织成员国更倾向于“尊重主权”而非“让渡主权”来维持集体行动的可持续性。正因如此,“薄的承认”被视为上合组织在实践“去安全化”时的基石:既不强迫成员国牺牲核心利益,也不刻意削弱其内部主权意识,缓解了安全化倾向中内在的对抗性,为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正因为各成员国都在上合组织给予“薄的承认”中获得了基本的尊重与平等地位,契合各成员国对“价值理性”的诉求,组织内部才得以在较为复杂和多元的地缘环境中保持合作意愿,并不断拓宽合作领域,逐渐迈向更高程度的“去安全化”。基于此,“薄的承认”是上合组织在地区安全与多边治理中凸显价值理性、稳定多边关系、增强整体韧性的核心基石。

(三)上合组织对“情感”的实践:“厚的承认”

上合组织的“厚的承认”与成员国对“情感”诉求十分契合。“厚的承认”是在“薄的承认”基础上尊重行为体的特殊性,上合组织通过尊重成员国制度文化差异以增加彼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属于“厚的承认”。在“薄的承认”框架下,国家行为体的交往往往局限于形式化的主权平等与程序互惠,尽管对主权的承认十分重要,但难以触及成员国内在的身份认同与情感需求。而“厚的承认”通过主动接纳不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为成员国搭建了更深层次的对话平台。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分别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社会分工论》中利用“情感”来分析社会问题,他们均意识到“情感”要素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53]本文借鉴“情感”动机,认为“厚的承认”之所以对应“情感”动机,是因为其超越了纯粹的利益交换和价值关怀逻辑,转而强调“共情”与“理解”在区域合作中的纽带作用。当一国的制度选择和文化价值被视为合作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而非需要“被迫调整”的外部变量时,成员国自然会自然产生更强的情感归属感。例如,上合组织通过非强制性协商机制,允许成员国在反恐、经济发展等议题上保留较大的政策自主性,此举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更通过制度包容传递了“安全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厚的承认”内含的对差异性包容,实际上回应了全球化进程中部分国家对于文化主体性被稀释的焦虑。上合组织成员国多为“全球南方”国家,其参与国际事务时既有融入全球体系的需求,又具有强化本土认同的强烈意愿。通过制度化的文化互鉴与经验共享,“厚的承认”

将这种双重诉求转化为集体情感资源,使合作不再是简单的规则遵从,而是基于彼此尊重的“共同体”建构。这种情感联结既缓解了权力不对称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也为区域合作注入了可持续的凝聚力。如果说“薄的承认”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入门许可”,让成员国得以平等地进入上合组织的多边互动中;而“厚的承认”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相互认可,使之成为一种更具情感和价值取向的共识。如此,“情感”这一动机便与“去安全化”形成了内在的纽带:当各国真正从情感层面体会到彼此的处境、期待与焦虑时,就更容易将“对方”从潜在威胁的名单中剔除,从而转向构建一种基于信任与尊重的合作关系。“厚的承认”的获得,有助于各国得以在自我身份与利益诉求之外,真切地感受并理解他者的独特性,从而为“去安全化”开辟出更为宽松与柔性的对话空间。当成员国都充分相信对方不会随意将其“安全化”时,成员国对于安全共同体的意识愈发明朗,为此各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抛却“以邻为壑”的零和思维,为进一步深化合作与共同发展创造了更加坚实的信任基础。

(四)上合组织对“习惯”的实践:深化团结

上合组织的深化团结回应的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对于“习惯”的诉求,首先,从组织的演变历程来看,上合组织最初由“上海五国”机制演变而来,在长期、反复的外交互动过程中,各成员国逐渐形成了解决问题时自动选择团结协作而非单边行动的模式。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惯习”是指个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持久性倾向和习惯,它影响个体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54]因此,成员国在实践中形成的团结互助的“习惯”也会影响它们后续的行为,以致它们更倾向于自动地选择团结协作,这表现出“习惯”所具备的“自动化”特征。其次,上合组织在实践中形成了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例如每年举行的成员国元首峰会、总理会议以及各部长级磋商会议,已经成为组织内部的一种惯例,这种惯例的长期存在进一步强化了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意识。这些程序更多反映的是组织成员团结起来解决共同问题,随着这些程序的常态化运行,上合组织在实践中强化了成员之间团结互动的“重复性”。当区域内安全问题发生时,各成员国倾向于利用组织内部机制进行团结协作,而非其他方式协调行动,这种行为模式在多次危机处理中得以巩固,体现了高度的“稳定性”。最后,团结合作深刻植根于“上海精神”之中,上合组织成员国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自然选择合作而非冲突,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行动倾向。从成员国领导人的官方表述中,我们能够看出团结已成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道路中的不可或缺的“习惯”性指引。

在上合组织扩员的背景下,团结作为上合组织发展的核心价值,始终贯穿于其运作与实践中。^[55]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如果缺乏对“团结”这一习惯性追求的坚持,很有可能导致组织在扩员后逐渐松散,影响其凝聚力和整体运作效率,进而危及区域安全合作的稳定。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长期的互动与协作,形成了一种不依赖强制约束而是基于共同实践的团结性“习惯”。成员国之间逐渐形成了默契和共同的合作模式,尤其在安全与反恐等领域,通过长期的协作和互动,成员国不仅减少了合作中的不确定性,还提升了应对区域性安全威胁的效率。这种“习惯”使得上合组织在面对扩员挑战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新成员,并通过长期积累的集体认同与行为模式,实现组织的整体稳定和团结。正是通过习惯性合作,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与协调逐渐深化,上合组织不仅在表面上维持团结,更在内在行为逻辑上形成了合

作基础,有助于组织在面对复杂国际形势时依旧能够保持一定的行动力。然而需要承认的是,尽管团结合作已逐步成为一种组织“习惯”,但上合组织近年来的加速扩员,尤其是新成员国带来的差异性,正在一定程度上挑战这种“习惯”的稳定。尤其是印度的加入使其成为上合组织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不利于上合组织的团结合作。如印度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拒绝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该组织中唯一拒绝签字的国家。^[56]这对于上合组织原有互动的惯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动摇,这表明“习惯”的巩固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在重复的实践中不断强化。基于此,上合组织未来应进一步优化其合作机制,保持长期稳定的互动实践,以确保团结合作的“习惯”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在上合组织的“去安全化”路径研究中,通过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感”和“习惯”四种行为动机的简要分析,本文揭示了上合组织如何通过多维度的机制设计和实践形态推动自身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基于韦伯的四种行为动机,可以看出,上合组织在构建安全共同体时选择“去安全化”路径的深层逻辑,在于其能够有效回应成员国对组织的四种诉求与期望。从这一深层逻辑的视角出发,上合组织通过“去安全化”的路径,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安全理论的多边合作范式。这一范式不依赖于对国家主权的让渡,而是在尊重成员国主权以及差异性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安全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上合组织的实践中,很少只有一种动机发挥作用,事实上,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感”和“习惯”这四种动机往往是彼此交织、共同影响的,“上海精神”就是在实践中各种动机并非孤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一种最直观体现。上合组织成功的实践路径为全球其他区域性组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平衡国家主权与多边合作,如何在合作中减少“安全化”倾向,如何在文化与制度差异中找到合作共识,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与借鉴的关键问题。

四、上合组织以“去安全化”路径推动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启示

为了应对地区内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并在复杂的多边环境中实现可持续的合作,上合组织需要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安全合作方式。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安全化”已成为安全共同体构建的一般路径,但随着“全球南方”的逐渐崛起,金砖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等逐渐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它们更多的是通过“去安全化”来减少各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疑虑,进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安全共同体构建道路。上合组织在构建安全共同体时不应当盲目跟随西方过去的“安全化”步伐,应当从“去安全化”中获取更多的启示。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强调,上合组织构建了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这启示我们,上合组织是一座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富矿”,我们应该认真挖掘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安全领域为视角,探析上合组织在构建安全共同体时的路径。上合组织在推动安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突破了传统安全观念的局限,并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了“去安全化”的独特模式。这一创新路径不仅为上合组织提供了应对新兴安全挑战的灵活选择,也为构建一个包容、稳定的安全共同体探索出一条突破西方传统安全化模式的新型道路。事实上,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模式”(SCO Way,简称“上合模式”)的既有

研究中,有学者对这一模式进行分析和提炼,认为“安全合作拓展的地区合作方式”“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等五种模式共同构成了“上合模式”,这五种模式为我们思考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构建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57]鉴于“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与本文探讨的“去安全化”相关性较强,本部分将重点围绕“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探讨上合组织以“去安全化”路径推动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启示。

第一,应同舟共济,安危共担,重视共同安全,通过不断加强安全合作满足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安全公共产品的基本需求。这要求上合组织应承认各个成员国的安全利益,始终坚持不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的原则,防止出现成员国摆脱现有组织框架、与组织脱嵌等问题。即使某一领域出现冲突,一国在组织精神的影响下不会轻易采用军事手段破坏组织的稳定性,这样的组织具有较高的“可预期性”。这种“可预期性”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组织内的各成员国,给各成员国带来安全感。如今,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安全公共产品,不仅满足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还可为构建新型的国际安全秩序提供动力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响应安危共担原则,不仅需要在坚持问题导向思维的基础上解决本国的问题,还需要承担起解决他国问题的责任,以循序渐进地解决影响区域发展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借鉴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先贤思想,这对于组织的长久生命力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同时,“不欲勿施、立己达人”具体到安全上,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整体,安危共担,我们彼此的安全是互相成就的结果。基于此,上合组织需要从“不欲勿施、立己达人”高度来构建安全共同体,不断引领各成员国走安危共担之路。

第二,应坚持“薄的承认”,恪守主权平等基本原则,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应当是建立在主权平等上的共同体。在过去安全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安全化”的路径往往要求组织内部的成员国需要主动让渡部分主权来实现“集体安全”,换言之,西方世界的安全共同体往往通过牺牲主权来换取绝对安全。上合组织应当摒弃西方世界宣传的绝对安全,始终坚持给予成员国以“薄的承认”,建立起包容而非零和博弈的地区秩序。从现实维度分析,中亚地区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该地区不仅处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同时也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还面临着其他域外大国影响力的持续渗透。在这种背景下,中亚国家更需要通过坚持主权平等原则来维护自身利益,避免在大国博弈中沦为工具或棋子。主权平等原则的确立,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维护独立自主的同时,积极参与区域安全合作。从制度维度看,主权平等原则为上合组织的机制设计和运行提供了基础保障。上合组织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确保每个成员国,无论大小,都享有同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种制度安排既尊重了中亚国家作为组织主体的地位,也为组织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这种基于主权平等的制度设计也有助于防止组织被某个大国主导或操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地区共同利益。上合组织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薄的承认”不仅体现在组织章程中,更需要在具体实践中得到深化和落实。尤其对于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议题,上合组织更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各方最基本意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第三,应坚持“厚的承认”,尊重成员国的特性和文化差异,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上合组织作为一个跨文明的合作平台,其成员国涵盖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宗教信

仰和发展阶段,这种多样性恰恰构成了组织的独特优势。在推进“厚的承认”的落实方面,上合组织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行动。首先,在机制建设层面,应建立多层次的文明对话平台。可在“2024·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探索出双多边文明对话交流合作机制,定期举办成员国文明互鉴论坛,通过增进文化理解来夯实安全合作的社会基础。其次,在政策制定层面,应充分考虑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成员国,可在安全合作项目中纳入发展援助内容,帮助其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对于面临特殊安全挑战的成员国,则应量身定制合作方案,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最后,在实践层面,应重视民间交流在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可以通过各成员国之间的智库对话、青年交流、民间组织合作等方式,培育共同的安全认知和价值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践行“厚的承认”时,上合组织还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凝聚共识。可以通过建立分层次、分领域的合作机制,在非敏感领域率先深化合作,逐步扩大共识基础。二是如何平衡文化认同与安全利益。应该将文化交流与安全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文明对话增进互信,以互信促进安全合作。三是如何避免文化差异成为合作障碍。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合作机制,允许成员国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参与的领域和程度,不追求“一致化融合”,实现“有差别的融合”。通过这些具体措施,上合组织可以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安全共同体。

第四,应加强“上海精神”的传承与实践,深化成员国间的团结互信,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合作深化与制度化建设。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超越传统的“成本—收益”逻辑,形成更高层次的团结合作惯习。所谓团结合作惯习,是指通过持续的制度实践和互动积累,使团结协作成为组织成员的自觉行为模式,这种惯习的形成对于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安全是一个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识过程。^[58]如果一个群体里每个成员都具有了团结的意识,那么当遇到威胁时,这一群体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单个个体力量之和甚至超出单个个体力量之和,此时每个成员的安全感也会更加强烈。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亚地区的国家即使在某一领域产生矛盾,也往往会团结起来“以一个声音说话”。团结不仅能够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筹码,更能够形成规模效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在上合组织这个团结的大家庭里,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从而有助于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全球治理等重大议题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强调,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一路走来的成功经验,也是新征程上应变局、开新局的必然选择。上合组织是中国参与的跨地区主义的主要案例,也是中国倡导构建的第一个地区组织,其坚持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59]

其价值和要求至少体现四个方面:首先,团结合作的不断加强需要各成员国坚定传承弘扬“上海精神”,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深化彼此的信任与合作。“上海精神”正是上合组织形成团结合作惯习的思想基础,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培育团结合作惯习既是应对外部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组织深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次,团结合作的不断加强需要各成员国持续完善多边合作机制,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纽带。通过深化经贸往来、扩大投资合作、加强互联互通建设,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网络,各成员国在发展中

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这种实质性的利益纽带将为团结合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再次,团结合作的持续深化离不开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政策协调。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严峻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需要加强战略沟通,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关键议题上形成共识,以更加统一的立场维护共同利益。最后,团结合作的长远发展必须着眼于人文交流的深化。通过教育、文化、青年、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民意基础,从而为团结合作提供持久动力。这些要素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上合组织深化团结合作的系统工程。总而言之,只要上合组织继续秉承“上海精神”,继续贯彻“去安全化”的安全共同体构建路径,那么,上合组织不仅能为组织自身发展不断赋予新动力,而且有助于为地区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宝贵的“上合经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N].人民日报,2024-07-05.
- [2]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0-11-11.
- [3] 董军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240427/95869c3b199d4d27943e52ea70133821/c.html>,2024-04-27.
- [4]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6-86.
- [5] Didier Bigo. Polices en Réseaux. L'Expérience Européenne[M].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1996.
- [6] Steven Ratuva. Subalterniz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Critique of Mainstream "Western" Security Discourses[J]. Cultural Dynamics, Vol.28, No.2, 2016, p.213.
- [7]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Macrosecritisation and Security Constellations: Reconsidering Scale in Securitisation Theory[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5, No.2, 2009, pp.253-276.
- [8]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9] 伊曼纽尔·阿德勒,迈克尔·巴涅特.安全共同体[M].孙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 [10] Ole Wæver.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9-118.
- [11] Bahar Rumelili. Breaking with Europe's Pasts: Memory, Reconciliation, and Ontological in Security[J].European Security, Vol.27, No.3, 2018, pp.280-295.
- [12] Anders Wivel and Ole Wæver. The Power of Peaceful Change: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balancing of Europe's Regional Order[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0, No.2, 2018, pp.317-325.
- [13] Thomas Ambrosio, Carson Schram and Preston Heopfner. The American Securitiza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U.S. Geopolitical Culture and Declining Unipolarity[J].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61, No. 2, 2020, pp.162-194.
- [14] Paul Roe. Is Securitization a "Negative" Concept? Revisiting the Normative Debate over Normal Versus Extraordinary Politics[J].Security Dialogue, Vol.43, No.3, 2012, pp.249-266.
- [15] Claudia Aradau. Security and the Democratic Scene: Desecuritization and Emancip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

- 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7, No.4, 2004, pp.388-413.
- [16] 魏志江, 卢颖琳. “偏执”与“回避”: 安全化困境的形成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1): 35-36.
- [17] 庞珣. 反思与重构: 全球安全和全球治理的风险政治理论及方法[J]. 国际政治研究, 2024(2): 41.
- [18] 余潇枫, 张伟鹏.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 30.
- [19] Jonathan Luke Austin and Philippe Beaulieu-Brossard. De securitisation Dilemmas: Theorising the Simultaneous Enaction of Securitisation and Desecuritisatio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4, No.2, 2018, pp.301-323.
- [20]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M].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 [21] 石之瑜, 侯长坤. 全球南方与安全社群——对理论的去殖民化反思[J]. 国际展望, 2024(6): 2.
- [22] 张景全.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及其视域下的周边安全[J]. 东北亚论坛, 2018(1): 27.
- [23]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28.
- [24] Marc Lanteigne. "In Medias 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 a Security Community[J]. Pacific Affairs, Vol.79, No.4, 2006, pp.605-622.
- [25] James MacHaffie. Mutual Trust without a Strong Collective Identity? Examin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 a Nascent Security Community[J]. Asian Security, Vol.17, No.3, 2021, pp.349-365.
- [26] 朱永彪, 魏月妍.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前景分析——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J]. 当代亚太, 2017(3): 42-43.
- [27] Thomas Ambrosio. Catching the "Shanghai Spirit": How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motes Authoritarian Norms in Central Asia[J]. Europe-Asia Studies, Vol.60, No.8, 2008, pp.1321-1344.
- [28] 戴长征, 毛闰铎. 从安全困境、发展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代国家安全理念的变迁与超越[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6): 35.
- [29] 曾向红. 论区域国别学中的焦点—场域法[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4(5): 70-71.
- [30] Roy Allison.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in Central Asia[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0, No.3, 2004, pp.463-483.
- [31] 陈小沁, 潘子阳. 全球安全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安全治理[J]. 东北亚论坛, 2024(3): 13.
- [32]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 等. 俄罗斯智库专家论新形势下中俄合作[J]. 东北亚论坛, 2023(5): 31.
- [33] 殷敏. “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研究: 现状及范本建设[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3.
- [34] Pierre Allan and Alexis Keller. Is a Just Peace Possible without Thin and Thick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1, pp.71-84.
- [35] 李孝天. 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 开创地区主义的“上合模式”[J]. 当代亚太, 2023(4): 111.
- [36] Bruce Russett. A Neo-Kantian Perspectiv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Build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68-394.
- [37] Eva Seiwert. China's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Syria[J]. Europe-Asia Studies, Vol.76, No.3, 2024, pp.411-432.

- [38] Marcel De Ha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s Momentum towards a Mature Security Alliance [J]. *Scientia Militari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Vol.36, No.1, 2008, p.30.
- [39] 理查德·内德·勒博. 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M]. 陈定定,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40] 约翰·加尔通. 和平论[M]. 陈祖洲, 译.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6.
- [41] J. Marshall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Indigeneity, Cosmology,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42] Roy Allison. Protective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Policy Coordination: Comparing the SCO and CSTO [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3, 2018, pp.297-338.
- [43] Liang Quan. Analysis of Current Conditions an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Cultural Partnerships to Enhan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SCO Framework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Vol.1, No.7, 2024, pp.183-197.
- [4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11/content_5560420.htm, 2020-11-11.
- [45] 邓浩.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新变化及其应对[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3(3): 18.
- [46] 马克斯·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顾忠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47] Mona Lena Krook and Jacqui True. Rethinking the Life Cycle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1, 2012, pp.109-110.
- [48] Weiqing Song. Feeling Safe, Being Strong: China's Strategy of Soft Balancing through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0, No.5, 2013, p.668.
- [49] 姜再冬. 加强团结协作 共建美好家园[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1213/c1002-40381055.html>, 2024-12-13.
- [50] 拉希德·阿利莫夫. 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发展和前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51]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6/14/c_1124625213.htm, 2019-06-14.
- [52] 曾向红, 邹谨键. 反恐与承认: 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J]. *当代亚太*, 2018(4): 119-120.
- [53]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敬东,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 [54]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55] 曾向红, 高伟通.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进程中的“组织团结”机制[J]. *俄罗斯学刊*, 2024(6): 24.
- [56] India Reiterates Opposition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 SCO Conclave [EB/OL].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dia/india-reiterates-opposition-to-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at-sco-conclave/articleshow/114282891.cms?from=mdr>, 2024-10-16.
- [57] 曾向红, 罗金. 试析“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内涵与价值[J]. *南亚研究*, 2024(2): 1.
- [58] 张景全, 吴昊.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 东北亚区域的国家与同盟角色[J]. *东北亚论坛*, 2017(1): 101.
- [59] 王志, 屈佳荣. 比较地区间主义: 演化、路径与中国视角[J]. *东北亚论坛*, 2022(5): 89.

〔责任编辑 孟祥臣〕

power means"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s"—into it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The specific poli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s are: at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level, Japan's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have rapidly shifted from the initial "open and inclusive" approach to a "bloc-based" pattern; 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coordin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cy focus has been adjusted from trade disputes to economic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important strategic materials; at the foreign aid level, the policy has changed from indirectly achieving potential political strategic intentions to directly supporting security strategies for military purposes. Japan's active planning and multiple strategic adjustments in economic diplomacy aim to effectively serve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integrate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y. However, thi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ith a strong strategic tendency also faces multiple constraints such a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cognition and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on interests during its deployment and advancement, and further impacts the already strained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Japan should consciously correct the "weaponization" tendency in it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 to build a constructive and stabl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Economic Diplomacy; Geoeconomics; Regional Cooperation; Economic Security; China-Japan Relations

"De-Securitization": A Unique Approac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 Security Community

ZENG Xiang-hong DU Jia-ming • 76 •

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ies generally follows the path of securitization. Howev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has explored a unique "de-securitization" path to build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practice. Specifically, the "de-securitization" path followed by the SCO is first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from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to the SCO itself; second,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security" have promoted its "de-securitization" process; finally, the "thin recognition" and "thick recognition" granted by the SCO to its member states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Shanghai Spirit" and promote the "de-securitization". According to Max Weber's four types of behavioral motivation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SCO security community adopts the path of "de-securitization" lies in its deep consider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respond to the four demand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SCO member states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Among the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emphasizes the SCO's shared security responsibilities; value rationality underscores the "thin recognition" granted by the SCO to its member states; emotional rationality highlights the "thick recognition" bestowed by the SCO on its member states; traditional rationality aims to satisfy the member states' desire to enhance regional solidarity. Facts have proved that the path of "de-securitiz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 security community, and can provid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Key Words: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Securitization; De-Securitization; Security Community; Behavioral Logic; Central Asia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System and the "Re-Selec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SUN Yun-fei • 92 •

Abstract: As the dema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PGs) supply system, the Global South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passive recipient, but this view ignores the dynamic role of the demander. When the supplier changes the content and nature of the goods, it directly affects the demander's product selection and the "reward" that is reciprocated to the supplier. As the key supplier in the IPGs supply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dually weaponized the supply, focusing on the supply of adversarial club public goods. This trend has led to a growing rift between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in concepts and demands of goods, as well as an intensified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IPGs. Therefore, the Global South has started to independently supply IPGs through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hile advocating for reforms in the existing supply system.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has changed the unequal exchange relations within the IPGs supply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enhanced the voic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South, and impact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upply system. However, whether the "re-selec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can truly disrupt the IPGs supply system inherited from the Cold War depends on the continuous efforts and deeper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in the South and more crucially, their ability to avoid unnecessary excessive competition among emerging supplier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PGs); Global South; Weaponiz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Exchange

Digital Currencies: Risk Challenges, National Regul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CHEN Wei-guang HAN Xue-ying MING Yuan-peng • 111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urrencies has given rise to a range of risks, including market volatility, technical vulnerabilities, illicit activities, 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 data breaches, and currency competition. In response,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a variety of regulatory measures, including legitimacy and market access regulations for cryptocurrencies, taxation supervision, and issuance mechanisms, circulation management, and cross-border use regulations for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s). However, divergent regulatory objectives, targeted entities, and mechanisms across countries have resulted in a fragmented global regulatory landscape, which struggle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risk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ross-border use of digital currencies. Consequently, establishing a global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digital currencies has become imperative. This requires coordinated progress in technical standard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rule-making systems. Key measures include enhancing cross-border regulatory cooperation, harmonizing compliance frameworks, and promot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mong major economies. Looking ahead, China may consider the strategic inclusion of Bitcoin in its national reserve portfolio and leverage the digital yuan as a policy instrument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advance the process of de-dollarization orderly.

Key Words: Digital Currencies; Cryptocurrencie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CBDCs); Risks and Challenges; National Regulation; Global Governance